

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与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作者] 胡鹏林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文化研究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既是其哲学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文化研究向其他领域渗透。场论、惯性系、宇宙膨胀,权力、大众化、文化工业,这些都是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表现,文化批评是其具体实践方式,文化主义思潮和天人合一也在进一步改变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文学研究不可能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但是必然在文化研究的刺激下表现出新的创造力。

[关键词] 文化研究,文化工业,文化批评,文学研究,文化转向

文化研究作为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游走于各种学科之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创造力,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文化研究更加注重文学研究的文化场,把各种与文化相关的现象纳入大文化背景中予以分析,不仅在文化史背景中阐发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还阐明各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探寻其共通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把研究焦点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一些非主流文化也成为研究重心,从而打破了文学研究的自我封闭状态,与政治和权力话语以及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工业紧密相关。文化研究的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深层的内在哲学思想基础,分别对应着科学哲学和后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

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非文学化的危机,亦如利奥塔所说:“艺术和文学上的研究受到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另一方面是艺术和书籍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将取代文学研究,而只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与当前文学文化现实相适应的研究视角。此外,文化主义和天人合一的重新阐释也在文化研究的视阈中推动了文学研究的思维转型。

场论、惯性系、宇宙膨胀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有机过程,重在“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不断变化的价值体系的教化中形成一种延续的历史状态,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等。历史文化学家冯天喻先生认为文化实质就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这里又包含着内化和外化两种过程。内化过程即文化主体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被塑造的过程,通常的文化研究主要指向这一过程,更多地关注内化过程中影响文化主体的信仰与道德、审美观与世界观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艺术作品。外化过程是指改造外部世界,进行社会实践使“自然人化”的过程,更多的是表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等等,从这一角度出发,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可知,注重内化过程的文化研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是对生活或艺术中的“永恒秩序”或与人类有普遍的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而关注外化过程的文化研究不仅包括这种理想状态,还包括更为广阔的文化场。正如一些文化研究者“力图把实践重新置于变

动不居的力场 (field of forces) 之内,建构事物的仿佛正当其位和摆脱了差异的结构” ,我们同样可以把各种思想观念、艺术作品和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置入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场内,重新确定其意义坐标和价值取向,在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寻求在新文化场中的意义和价值。文化场来自物理学和科学哲学思想,并非虚空的幻想,爱因斯坦指出:“场的概念经过一番周折逐渐地在物理学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而至今还是基本的物理概念之一。在一个现代的物理学家看来,电磁场正和他坐的椅子一样实在。”然而这种实在的场论观点并不是永恒确定的,场论随着物理学尤其是近代以来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发展而具有新的思维意义,这也是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内在思维基础。

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理想化状态的科学理论,他所谓的自由粒子、不计摩擦等等都是理想的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而牛顿定律只能在惯性参考系中成立;文学和文化的传统研究就是基于这种经典的科学思维。事实上,牛顿力学中的地面和地心不是很好的惯性参考系,因为地球有自转和公转;太阳围绕银河系的中心旋转也否定了一直被人们所认同的日心参考系。目前最好的实用参考系,是以选定的 1535 颗恒星的平均静止位形作为基准的参考系——FK4 系。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类同于 FK4 系,分析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在崇高精神和绝对理性基础上进行纯粹的理想化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文化是某一社会的全部生存和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指被知识分子所公认的高雅的、令人敬仰的那一部分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因此我们不能只是坚持一种纯粹的研究方式,像经典力学的惯性系:虽然由地面、地心发展到日心甚至 FK4 系,但是它始终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人为地排除了经典力学不能成立的更为广阔的参考系,即非惯性系。惯性力场等效于引力场,非惯性系与惯性系的区别仅在于引力场,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描述:一切参考系都是等价的,不论是在惯性系还是在非惯性系中,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有相同的表达形式。这也就否定了惯性系的绝对性和特殊性,同时也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开阔的思维空间。任何企图定义和限制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经典思维都将失败告终,人类的全部生存和生活方式是不可定义的,只能在不同的参考系中寻求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的意义和价值,文学研究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生机。然而要进一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彻底消除经典思维的余毒,不得不求助于现代科学宇宙观。

在爱因斯坦之前,人们一直都在寻求关于宇宙的绝对规律和真理,虽然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等都极大开阔了宇宙的空间,但始终没有对宇宙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作出科学的描述。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本身却预言:“时空在大爆炸奇点处开始,并会在大挤压奇点处(如果整个宇宙坍缩的话)或在黑洞的一个奇点处结束。”宇宙“既不被创生,也不被消灭。它就是存在”,人们通常以为宇宙以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存在了无限长的时间,“人们倾向于相信永恒的真理,也由于虽然人会生老病死,但宇宙必须是不朽的、不变的,这种观念才能给人以安慰”。这种思想观念反映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是人们一直追求的审美乌托邦代替上帝和天堂来慰藉世人困顿的灵魂。因此文学和文化研究在这种经典思维的操控下,一直以确定的、绝对的、崇高的理念为目标,而逐渐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最终形成新的上帝。宇宙膨胀的观念警醒了人们。1929 年哈勃发现星系是红移的,这就意味着宇宙中一切都是远离地球而去的,宇宙并不是处于静态,而是在膨胀着。因此不存在一种关于宇宙的最终理论,只有越来越精确地描述宇宙的无限的理论序列,甚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也制约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由于预言了无限大的点而预示了自身的垮台,正如同经典力学由于隐含着原子必须坍缩成无限的密度,而预言了自身的垮台一样”,众多理论的垮台意味着取消了上帝和经典思维,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也因此得到解放。但是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正如人们意识到了牛顿力学的巨大局限性却仍把它作为力学的基础知识加以学习和探究,传统审美中的绝对理念、理性精神和终极追求并没有因为思维的转型而消亡,这些仍然活跃在人们的思想之中,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新理论并不是要毁灭旧理论,“它

倒是像爬山一样，愈是往上爬愈能得到新的更宽广的视野，并愈能显示我们的出发点与其周围广大地域之间的意外的联系。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还在那里，还是可以看得见，不过显现得更小了，只成为我们克服种种障碍后爬上山巅所得到的广大视野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而已”。

科学追求真理，文学源于想象，这是极真与极幻之间的区别。从上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场论、惯性系和宇宙膨胀等等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思维转变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是隐性的、间接的，但是从文学层面来讲，却又是深层的、内在的。文学史上每一次文学精神的新发展、文学与文化思潮的更迭，无不与科学对人类自身局限的批判和对宇宙未知领域的宏观或微观地进一步探索密切相关，人类思维由此而发生的革新必然引起人们对自我生存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估价。

权力、大众化、文化工业

文化研究关涉的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生活方式，作为审美的文化界定了前者，而要在文化中实现这种价值就会涉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亦即政治权力。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可以视为“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主要“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

权力主要包括话语权和政治权。文本的权力首先体现在话语权上，语境是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具有不同的上帝观念，“上帝”和“主”代表着不同的话语权，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之别；《圣经》就是基督教文化在话语权意义上的文本形式。政治权更多的体现在性别、种族、民主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方面，人们发现审美文化的实现和话语权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变革。尤其是在近年来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和反霸权的斗争中，关于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探讨，对权力的中心地位及其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尔都塞和伊格尔顿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了庸俗社会学的幼稚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与人的意义、价值、感情、经验以及身份、符号、语言、生活方式和历史形态等密切相关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必然与更为深广的信念相联系：个体与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问题，以及对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理解和未来的展望。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一直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甚至文学和文化有时就是一种“表述自己政治需求的语言，而不是一种使人愉快的奖赏”。

由此可知，权力在文化研究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和话语理论系统也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非中心、反权威意识的增强，权力也在逐渐被解构。研究麦当娜的性感与哈姆莱特的迷茫已无价值大小之分，油漆工用来涂墙的刷子与达芬奇用来绘出《蒙娜丽莎》的画笔作为工具而言并无二致。由此足以看出大众文化已对精英文化提出了严峻挑战，大众化使文化研究正逐步走出利维斯主义的狭隘精英意识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典文学及其伟大传统，逐渐转向种族、性别、区域文化和传媒研究。以传媒研究为例，当今各种影视、广告、MTV、摇滚风潮涌向大众，直接影响和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著名文化研究者莱恩·昂在公开征集了美国大众对电视连续剧《达拉斯》（曾在中国播映，译名为《豪门恩怨》）的反应后认为，大众文化的消极形象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 响。但是事实上，绝对公正和有价值的审美判断标准对于大众文化是不相称的，大众文化在审美本质和标准上是多元的，犹如电视机的遥控器，如果你不喜欢观看青春偶像剧，可以自由选择好莱坞动作大片，或是《巴黎圣母院》之类的经典名片等等。这些都是因人因时而定的，总之审美标准掌握在大众手中，只是“它的基础

是对文化形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的肯定、根深蒂固的参与欲望、以及感情的投入”。而且对于通俗审美来说，快感似乎成为核心概念，但是这又不同于经典文学的审美快感，而是属于个体的快感和体验。这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审美观基础。此外，大众传媒中又渗透了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思想困境和文化实践的局限性。正如理查德·奥曼的举例，一则高露洁广告说比利·琼结交朋友就像赢得网球锦标赛一样容易，并解释说“喜欢她的人自然而然地来到比利·琼身边，原因之一即使她长期使用高露洁。”这无形之中就暴露了人们的社会焦虑、个人失败和孤独，而高露洁的购买却一并解决了这些烦恼，显然是利用了其意识形态性。

影视、广告、MTV等大众传媒早已显示文化商品化的倾向，并逐渐与后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工业密切联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生产在过去的时代与现代性的生产方式相分离，但是它最终会与后者重新结合并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随着大众文化和文化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论也出现了极端形式，甚至从生产的角度进行文化研究。“经济主义”和“唯生产论”的观点不符合当前的文化工业现状，这些模式忽视了文化生产的独特性，“文化生产被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同化，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文化商品路线的双重性质。生产状况不仅包括从过去的文化储存或从已经公共的话语领域吸取的众多既存的文化因素”。文学艺术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一种特殊制造业，艺术生产方式则是艺术形式的决定因素。文化产品是文化工业的必然结果，在我看来，要保持文化产品的多元性、丰富性和艺术性，就必须规范文化工业：一方面，要使文化产品彻底地大众化和商品化，按照商品生产规律和运作方式进行生产和流通，由此得到大众接受并使得具体文化产品，如影视广告、文学艺术作品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产品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更多的是传播一种思想观念、情感体验、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等等，常常以文本的形式和话语系统的形态见之于人，因此必须以思想的介入、情感的参与和意识形态的互涉为基础，全面提高文化工业的质量和文学文化的品格。

文化文本与文化批评

根据格斯伯格等人编选的论文集《文化研究》导言的归纳，文化研究的旨趣主要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和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等。对应这些不同的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文化形态及其文本形式，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本是指一切具有释意可能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内在意蕴，而不是主体性的意识。因此经典文学文本通常是以内在意蕴的分析为基础，从而探询其深层的封闭的美学意义，并没有向具有多样化主体性的大众化的语境开放，严格地从哲学和美学意义上讲，“现代性的结束必然意味着美学本身的终结，或整个美学的终结：因为如果美学充斥一切事物，如果文化领域扩张到一切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变成对文化的适应，那么传统的美学独立性或特殊性（甚至文化本身的特殊性或独立性）必然会模糊不清或完全消失。”这种经典文学文本的美学危机在文化文本中得到了缓解。文化文本不仅仅保留了传统的内在意蕴，更重要的是与整个文化体系相联系，面向大众化的语境，使多样化的主体性意识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来。文化文本突破了经典美学理念的限制，把视角转向大众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观。文化研究也不再是指向文本，而着眼于大众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与个体的主体意识。

文学研究因而出现文化的转向，文学批评随之兴起。文化批评不是把文本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符号系统从审美艺术角度进行解读，目的也不是揭示文本的“审美特质”和“文学性”，而主要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性以及其所隐含的文化—权力关系，近似于一种关于文本

的政治学。因此文学研究首先面临了非文学化的危机。非文学化主要是就广播、影视、音像和网络等各种文化形态的崛起并不断抢占经典文学的地盘而言的，现代大众传媒和文化由纸媒质转向电子媒质，使人类文化具有崭新的转载形式，这些都是与非文学化相适应的表象，可见危机是虚构的；文学的定义和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随着现代高科技革命和文化工业革新而变得模糊甚至部分地消失。其次，文化的转向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终结和视觉文化的兴起。传统的认识论和语言论中的思想和文化往往表现为经典文本形态，文学研究也信奉世界即文本的观念；而现代网络视觉技术和各种图像处理机制，使人们更多的从视觉化和具象化的视觉文化中获得信息和意义、轻松和愉悦，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文学的地位，世界即图像的观念向以经典文本（纯粹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视觉文化实质就是一种文化文本，是文化批评的核心内容。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出现过两次转向：第一次是语言的转向，是由外而内的转向，第二次是文化的转向，有人认为是由内而外的转向。在我看来，如果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研究兴起时确实存在着重视外部而忽视内部的内外之别的话，那么当前文化研究早已泯灭了内外的对立状态。以大众传媒研究为例，对影视、广告领域的研究不仅仅是注重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外部研究，还对内在审美特性加以关注，甚至衣食住行的物质层面也文化化、审美化。

此外，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关系问题，众多学者颇有争议。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包括、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促进文学研究角度来看却又是一种不合理的表述。文化研究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叛逆形式，文化研究有它自身的研究方法，而且逐渐消除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对立；文学研究不能仅把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大的语境和文化背景来看待，而应吸取和借鉴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论基础。尤其在文学界限模糊和文学研究踟躇不前的现状下，文学研究如果仅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实践”自居，庇护于文化研究的羽翼之下而得不到独立和自主地发展，最终将沦为极端的边缘学科或被文化研究所涵盖和溶解。关于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语境的问题，一位学者认为“要尝试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首先是由于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不期然呼应着文化研究所设计的基本命题；其次，中国文化研究的展开，其本身正是试图回应中国现实与西方理论的重大挑战。”这一观点基本适合于我国的文化研究，但我认为需要补充的是，必须注重儒家文化研究和国际新儒学思想对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

文化主义与天人合一

文化研究通常以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为研究平台，在此平台之上我们可以超越时空，与过去或未来相联结，而把我们的性别、种族、职业、信仰之类的现在状态悬置起来；而平台的周围又充斥着不断变化而又相对稳定的人类价值和审美意义，我们的思想和人生就在此层面上得到了充实和提升。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主义。伊格尔顿指出：“为什么大家都谈文化？当然还有比文化更重要的话题。如今，认为什么都是文化的观念在西方左派中非常流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主义学说。如同经济主义、生物主义、本质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一样，这种学说本身就具有还原论的倾向，与这些主义相比，文化主义是一种能够引起轻度恐慌的过激反应。与人类作为自然的物质动物所具有的共同之处相比，文化主义显然夸大了人为创造出来的、符码化的、习惯的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强调的是历史的可变性、相关性和间断性，而不是历史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文化主义属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地点——就我们而言，它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但是在今天，它似乎正在加速输入中国和其他‘新兴’社会。”

采取文化主义立场并不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特权，一切与文化有关的东西涌入人们的

研究视野，因而不得不加以重新审视。文化主义虽然具有“还原论”的倾向，但也不是一种引起恐慌的“过激反应”：文化主义不是所谓的把一切都按文化标准和规则予以重新定位的思潮，也不是属于某一固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如果认为文化主义属于资本主义西方并逐渐输入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那么是否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呢？文化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状态，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一种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境界，这种境界类似于文化主义的文化平台。正如李泽厚所言：“把美和审美引进科技和生产、生活和工作，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心灵世界，而成为推进历史的物质的现实动力，成为现代社会的自觉韵律和形式。只有在这样一个现实物质实践的基础上，才可能经过改造而吸收中国‘参天地、赞化育’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作为生态环境的外在自然）的和谐相处和亲密关系；与此同时，人自身的自然（作为生物情欲的内在自然）也取得了理想的渗透和积淀。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都获得了‘人化’，成为交相辉映的两个崭新的感性系统，这才是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美。”虽然此平台和境界都不具有实在性，是永远达不到的想象空间，但是正是在这一想象空间中，人们才能超越现实和“此在”的个体，扩充生存的空间，使焦虑的心灵获得一个形而上的栖息之所。文化主义的文化平台则侧重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而天人合一的境界更注重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两者的融合才是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美学境界。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21